

传 播 学 书 系

刘继南 主编



Mass 大众传播
Communication 与
and International 国际关系
Relations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刘继南 主编



Mass Communication and

大众传播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刘继南主编.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12

ISBN 7-81004-855-4

I. 大… II. 刘… III. 大众传播-作用-国际关系-研究 IV. 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4105 号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主 编 刘继南

责任编辑 韩旺辰

装帧设计 宁成春

版式设计 BBI 阳光工作室

出 版 人 王克瑞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4

电 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传 真 010 65779140

E-mail cbs@bbi.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纪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纸张供应 山东高唐纸业集团总公司

开 本 730×988 毫米 1/16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5.75 印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0 千字 印 数 1—3000

ISBN 7-81004-855-4/G·50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绪 论

刘继南

—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这个历史一直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有了国家便有了国家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然而，发源于古代社会的所谓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关系。一方面，古代社会的国家还是一种非常宽泛、不严谨、时兴时亡的组织形式，没有严格的边界，没有固定的人口数量，没有代表国家的政府机构，没有国家利益观念，诸如此类的特征都不具备，它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国家；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除了相邻国家之间时断时续的贸易、战争之外，一般处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而远隔千山万水的国家，更是不知有彼此的存在。如果要把这种国家间关系称作是国际关系，那也只是地域性的国际关系，并非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即我们今天所指称的国际关系。

17世纪上半叶有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另一个是“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欧洲的确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获取生产资料 and 商品市场的行为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最终逐渐将整个地球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开始具备它本身的含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大大被削弱，民族国家崛起，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完成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国家边界、主

权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国际会议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方式，一系列的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社会的特征初步形成，国际关系具备了本质的内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17世纪上半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发端。

国际关系在这个历史时期形成，除了因为民族国家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确立并向全球扩张之外，还有赖于同一时期交通和通讯等传播工具和技术的改进。航海工具和技术的提高，使得人类继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能够在几大洋上随意地往来，而通讯工具和技术的发明改进则使整个世界进入人类视野，从而使人类具有了世界眼光和国际意识。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种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印刷术的发明，尤其是15世纪德国人古腾堡的印刷技术的发明，使报纸的印刷发行在以后得以成为一种生产活动和行业。但是在15—16世纪时，报纸大多还是用手来抄写，被称为“手抄新闻”或“新闻书简”，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进入17世纪，定期的印刷报纸出现，标志着以大规模地采集和发布新闻信息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事业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在新闻传播领域还有另外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那就是1644年英国人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面世了。这本政论小册子对整个新闻传播或大众传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现在尚不能清楚地道出17世纪的传播领域与国际关系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但二者在同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在时空上给人一种“自然吻合”的印象，这确实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吻合在以后一直贯穿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的历史。当垄断资本家和寡头政治阴谋家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时，大众传播在世界各地正经历着它的垄断时期；当以广播电视为先导的信息时代到来时，国际关系的“冷战”时期也正在悄然降临。

事实上，大众传播与国际之间的联系几乎是天然的。这种“天然联系”首先直观地表现在大众传播的“浑沌”时代和国际关系的初始阶段。正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样，最早的“新闻书简”和“手抄新闻”主要是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情况的，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在英国，直到大革命时期，报纸（“新闻书简”）才开始重视刊登国内新闻。这种现象说明，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社

会”取得了联系，而且传播的内容大多与“国际社会”有关，英国17世纪时《每周新闻》的全称即为《来自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河西岸地区、法兰西与荷兰的每周新闻》。

当然，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不只是表现为历史上的吻合和“天然联系”，更表现为二者在内容上的交叉和功能上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或许还表现在其他我们尚未注意到的方面。其中，二者在内容上的交叉和功能上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应该是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大众传播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国际关系或与国际关系有关的领域和事物。20世纪初，当广播、电视新型传播媒介诞生之后，大众传播具备了它真正的实质，它对国际关系的关注更为密切，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体验。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开关，翻开报纸、杂志、书籍，我们总是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有关世界各地和全球事务的信息，我们无不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国际气息，这就是大众传播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力量的表现，是大众传播天然的关注国际社会的精神的延续。

随着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关注的密切程度的提高，大众传播开始主动、积极地介入国际关系领域，并且时不时地做出有影响的举动，这种影响有时微不足道，有时则是无以言表的巨大。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1898年2月9日《纽约日报》有意公开西班牙大使发回国内的信件，信中称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这一事件使美西关系骤然紧张。接着又对美国军舰在哈瓦那被神秘炸沉一事大肆渲染。《纽约日报》的老板赫斯特在此期间曾电告驻古巴记者：“你供给速写图画，我将供给战争。”此后不久，美西战争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都利用大众传媒展开宣传心理战，开辟了激烈程度不亚于正面军事战场的“第二战场”。这种攻心战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致于战后一些德国人声称，德国士兵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受协约国宣传的欺骗而投降的。

1996年美国向“没有战略利益”的索马里派出维和部队，遭到国内舆论抨击。不久，CNN在新闻节目中播出索马里的民兵拖着美国士兵在摩加迪沙大街上行走的镜头，美国国内民众情绪激动，克林顿总统不得不下令撤回美国维和部队。

诸如此类，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导致这些结果的根本原因也许并不完全是大众传播，但是如果没有大众传播的催化、煽动，结果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或者如果大众传播做出相反的举动，结果就更可能截然不同。

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某个事件或某个过程的影响只是一些特殊现象，而它对整个国际关系的进程和结构性变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真正普遍意义上的影响和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这一理论已被多数传播学者和公众所接纳。国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这一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传播的深刻影响。事实上，从大众传播的原始阶段和国际关系的创始阶段开始，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史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大众传播的介入和道德意识的增强，几千年来形成的攻城掠地、掳人抢物、血腥屠杀等战争的主要特征正逐渐淡去，即使偶有发生，马上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的文化意识不断地加强，文化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因素。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外交等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切活动的节奏都大大加快。在独立意识得到加强，并拥有像因特网一类的能够与国际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工具之后，普通个人频频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中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正引起社会的关注。

很明显，在这样的结合之后，大众传播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国际关系领域活动的发展不能缺少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成为国家实施外交战略的重要武器和借重的工具；另一方面，大众传播领域本身成为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斗争、较量的重要战场。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大力倡导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活动正方兴未艾。在东西方“冷战”中，大众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冷战”结束后，世界并不太平，随着国际斗争的日趋复杂，以大众传播领域为战场的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亦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有时甚至浑然一体，不辨你我。当我们观察大众传播时总能找到国际关系的影子，而当我们谈论国际关系时又总是不能忽视大众传播的作用。一个新的领域正在悄然形成，一个交叉学科也正在等待我们的关注和探索。

二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尽管已经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这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和课题，因此至少在目前来讲，对它的探讨和研究首先应该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两个不同领域分别入手，以便能从中找到这个交叉领域最原始和最本质的内容及特征。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本书在结构上分为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两个部分。

大众传播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事物，从内容上讲它包含传播的历史与过程、目的与策略、传者与受者、控制与效果等。从形态上讲，它有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也有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还有新型的“第四媒介”因特网。因此在谈论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时就不能撇开这些具体内容和特殊形态。

本书主要在印刷传媒、国际广播、卫星电视、通讯社和因特网五个方面，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探讨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

关于印刷传媒，我们在绪论的第一部分已经有过论述。大众传播的早期阶段实际上只有书籍和报纸两种形态，因此在谈论大众传播如何与国际关系建立“天然联系”时，要在很大的程度上把此归功于报纸这种特殊的印刷传媒。印刷传媒与国际关系的密切联系贯穿整个印刷传媒时代和继往开来的电子传媒时代。广播电视诞生后曾经有人提出“印刷媒介会不会消亡”的问题。现实的状况是印刷媒介并没有因为一代又一代新型媒介的问世而受到丝毫削弱，相反，它作为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的传播媒介，作为国际交往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牢固，更加突出。事实证明，印刷传媒曾经为推进国际关系的发展做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它将会为国际关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特设一章探讨国际通讯社与国际关系的关系。严格来讲通讯社并不是一种传播媒介，它只是一种向其他新闻媒介提供新闻信息的服务机构，或者说它是介于信息源与新闻媒介之间的媒介。通讯社的出现晚于报纸、杂志，但早于广播、电视。在大众传播尚不发达的时代，通讯社承担起了大部分国际范围内传递信息的重任。19世纪创建起来的哈瓦斯社（法国）、路透

社（英国）和沃尔夫社（德国）曾经一度垄断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信息供应市场。这种垄断权威为它们影响信息内容、影响政府决策、影响世界舆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今天，占据世界新闻霸权地位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几大通讯社已经成为美、英、法等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由通讯社引发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谈论“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不能不谈论通讯社。

广播和电视是 20 世纪初发明的以电子信号为载体的新型媒介，这两种电子媒介的问世大大地增强了大众传播的威力。以广播和电视为工具的国际广播和卫星电视两种传播方式进一步密切了大众传播和国际之间的联系。其中国际广播纯粹是大众传播适应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1927 年荷兰为维护其海外殖民地统治开始向它的殖民地地区广播，开创了对外广播（国际广播）的先河。以后国际广播的规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惊人的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国际广播电台已达 160 余座。卫星电视，尤其是直播卫星电视的出现，打破了电视传播的地域局限，电视信号的跨国传输变得十分便利，电视强劲的传播威力使得跨国电视传播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国际广播和卫星电视带来的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是国家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文化侵略”和“传媒帝国主义”成为传播弱势国家经常议论的话题。国际关系领域各方力量的争执、冲突也因此不断地尖锐、复杂和激烈。

因特网号称“第四媒体”，它的出现是大众传播领域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因特网的特点是无限性、自由性、多向性、交互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首先它把世界各地真正地连接起来，大大促进和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其次，由于传播过程的限制和控制极为困难，因此无论是因特网技术落后的国家还是先进的国家，它们的国家系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各种国家力量在各怀心思地谈论“文化帝国主义”时，在它们的身后又冒出无数个令它们共同感到心惊胆战的“黑客”。最后，因特网可能成为给国际关系带来最大的结构性影响的媒介。由于有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能够和全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力武器，任何一个普通个人都可能轻易地进入国际事务或国际关系的舞台。频频见诸媒体的美国五角大楼计算机中心网络被陌生人闯入、英国军事卫星被“黑客”移离既定轨道等等的报道，足以让有关各方警醒。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大众传播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它对国际关系

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或者促进国际社会之间的交往，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或者加剧国际社会的紧张冲突，对各国的舆论安全和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在充分肯定它对国际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更应该对它扮演的“双刃剑”的角色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是这把“剑”握在对手手中时，任何参加角逐的一方都不得不自始至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与大众传播一样，国际关系也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和抽象的事物。国际关系是一种融多个系统、多种形态于一体，由国家机器超越国界建立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因此，它也总是具体地表现为某种形态。本书列举了外交、文化、军事、贸易几种形态以及由国家机器为单元构成的特殊社会形态——国际组织。这些内容基本上包括了构成国际关系的主要领域。因此，分别在这些领域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应该都是比较全面的。

外交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在有的时候它简直就是国际关系的代名词。历史上许多体现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之间紧密联系的事件都发生在外交领域。大众传播对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 传统的信息源改变；(2) 外交决策的速度加快；(3) 参与政策议事的圈子扩大；(4) 外交决策和实施的复杂性和难度增加等等。除此之外，大众传播有时还直接进入外交活动，比如为政策出台和外交活动烘托气氛，向外界传送信号以试探对象的反应等等。大众传播对外交领域投注了非常大的关心，久而久之，外交对大众传播的依赖也越来越深。很难想象在今天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外交活动将如何展开。

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从宏观的角度看，大众传播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大众传播议题展开的无数次活动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文化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形态之一，是国际社会交流、合作最为频繁的一个领域，也是国家维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文化的交流、冲突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和国际关系历史，大众传播媒介相继出现并成为社会生活中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之后，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冲突就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断言冷战以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文明之间的矛盾。结论可能过于极端，但文化问题自此以后再度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其中，大众传播的分量不能等闲视之。

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形态，国际关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部国际军事史。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就起源于1618—1648年期间的“三十年战争”以及其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从那时到现在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地区性的和国与国之间的小战则经常不断，难以计数。大众传播作为动摇对方军心、鼓舞己方士气、缓冲和激化事端的有效工具，很早就投入到军事战场。尤其是广播、电视电子媒介一经发明，在正面军事战场之外就形成了“第二条战线”。“冷战”前后，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武器的“思想战”成为军事领域的主要对抗形式，并大大刺激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在军事战场上用途的开发。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军事冲突又衍生出“信息战”和“舆论战”等战争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军事战争、斗争的内容和观念。大众传播直接成为军事斗争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武器。

从表面看来，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近代出现的直接原因是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过介绍。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尽管大众传播并没有放松对贸易领域的关注，但因为战争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首要因素，大众传播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显然已经疏远了。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国际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备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电视直销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再度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和手段。

国际组织并不是国家属性中的内容，因此它与外交、文化、军事、贸易等也并不平行。但国际组织是国家各种属性、功能的延伸，外交的延伸出现了联合国，文化的延伸出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军事的延伸出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贸易的延伸出现了世界贸易组织。诸如此类的国际组织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的地位异常重要，没有国际组织，国际关系的秩序、格局，甚至其自身都将不复存在。国际组织不仅是国家的延伸，也是国家的重要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讲，谈论、观察国际关系是不能撇开国际组织的。从大众传播角度看，国际组织一直是大众传播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关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北约、国际奥委会等重大国际组织的信息充斥于各种媒体的报道之中。从国际组织的角度看，各种国际组织十分重视对大众

传播媒介的利用，都特别设有负责新闻传播的机构。一些国际组织还把大众传播的相关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议题。这方面联合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扮演主角的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斗争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国际传播学会”、“国际广播电视组织”、“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欧洲广播联盟”等一些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组织的相继出现，为全球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各国和各地区之间信息的交流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可以预见，在大众传播事业不断发展、国际组织作用进一步扩大的未来，二者的关系也将会更加密切。

把以上几个方面作为国际关系有代表性的内容，并且从中考察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已经渗透到了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容；同时，由于大众传播广泛地应用于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大众传播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各种新功能也得以开发。二者的这种结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结合，而是开辟新天地、建立新领域的结合；从学术的角度讲，则是提供新课题、建立新学科的结合。

本书特别在十章内容之外，增设一章“大众传媒与国际法”，由于与其他章节内容体例不一致，因此把它置于“附录”部分。建立合理有效的调整国际传播行为的法规体系，是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结合之后引出的新问题。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运动至今没有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无“法”可依。在人们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担忧日益加深之时，最佳的对策恐怕也正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因特网诞生之后，国际传播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网上犯罪、“黑客”行为时有发生，建立健全相关的国内法规和国际法规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三

对“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系统、专门性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是空白，在国外也不多见。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北京广播学院起步较早。1997年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点开始招收“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学生，立专

项培养在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交叉学科方面有深厚功底的外宣人才。此前，北京广播学院已于1995年在该硕士点设有“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研究方向。几年来，该学科点的师生们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有的研究成果以硕士论文的形式通过了专家、学者们的鉴定。

目前，从该角度研究的著作，国内尚未见到，只有一些关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方面的专著或编著。台湾于80年代曾出版由周莉音著述的《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1985年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由于作者曾在驻外使馆担任职员，积累了许多资料，所以该书从国家交往活动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论述较简单，涉及面较窄。日本学者内川芳美和柳进道夫编著的《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マス・メディアと国際関係，成蹊大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ノ1994年4月発行）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对媒体报道调查研究成果的总汇，主要从三国新闻记者的视角，分析三国新闻媒体如何相互报道，如何报道一些共同关心的中、日、韩某一国的对外政策，并由此揭示新闻记者在这些报道活动中的“意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新闻理论研究实践，但书中没有对三国报道活动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和概括。国外其他相关研究大多不是直接针对“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这一交叉领域的，而是在研究大众传播时涉及到了有关内容，如美国学者菲利普·塞布（Philip Seib）的《新闻外交——新闻报道是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Headline Diplomacy: How News Coverage Affects Foreign Policy, Praeger Publishers, 1995.），该书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分析了在外交政策方面，媒体、政府与大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的阿巴斯·马莱克斯（Abbas Malex）编著的《新闻媒体与外交关系——多角度透视》（News Media and Foreign Relations: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7.），是多人撰写的论文集，全书分理论和经验两部分，从多个角度研究分析了媒体与外交的关系。帕特里克·奥赫芬南的《大众媒介与美国对外政策》（Patrick O' Heffernan,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1.），通过电视在泛美航空公司847航班劫机案、巴勒斯坦人起义等事件中的报道等个案的分析，对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做了深入的研究。此外还有菲利普·M·泰勒（Philip M Taylor）的《1945年以来的全球传播、国际事务与传媒》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Media Since 1945, Routledge, London, 1997.), 桑德洛·布莱门 (Sandra Braman) 等的《全球化, 传播与跨国文明社会》(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Hampton Press, Inc., 1996.) 等。

总之, 上述著作各有特色, 都是“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与这些著作相比, 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研究的视角较全。全书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 一是从大众传播主要媒体 (印刷传媒、国际广播、卫星电视、因特网和国际通讯社) 的角度, 研究它们与国际关系的关系; 二是以国际关系的一些主要形态 (外交、国际组织、国际贸易、国际文化传播、战争) 为切入点, 研究它们与大众传播的关系; 三是研究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政策法规。研究力求全面、完整、系统, 不拘泥于一事一物, 而是力求揭示带普遍性的共同规律。

2、容量较大。全书 36 万字, 在字数和篇幅上超出已有相关领域的著作; 无论是研究大众媒体, 还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形态, 都是从历史源流、现状发展和未来展望三个阶段来探究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历史纵深感; 在勾勒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内在发展规律的总结与分析。全书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 涵盖面宽广。

3、融汇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横跨大众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独立学科, 交叉性很强, 涉及的面相当宽泛, 由一、两人在短期内完成一部体例严谨并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教科书是不可能的。因此, 本书的撰写充分发挥了专家群体的作用, 博采众长, 各出机杼, 集腋成裘, 以确保质量。参加撰写的有 13 个单位的 19 位专家、学者, 如果加上审稿、改稿和编辑的专家, 则有 24 人之多。可以说, 本书是众多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4、写作体例和风格比较适合国内的读者。

此外,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 我们注意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 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以及江泽民关于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为指导思想,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写历史, 要客观公正; 写现状, 要认真总结新经验, 探索新理论; 写未来, 着眼发展, 科学预测。第二, 写作中充分占有资料, 史论结合, 言必有据, 不发空论。第三, 突出大

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学科交叉的特点，无论是研究媒体与国际关系的关系，还是研究国际关系形态与媒体的关系，都要着力突出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交叉与融合。第四，要善于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更要尊重前人的劳动，所有引文、论据，都要注明出处。注释力求翔实、准确，保证本书的严肃性。

目前，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两个领域迅猛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而我们对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这一交叉领域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理论的滞后必然导致实践的盲从。这一状况亟待改变。进一步加强“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在明确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概念、术语和方法体系，构筑系统的理论框架，最终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学科，这是我们每一位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书目：

-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 徐耀魁主编 新华出版社 1998年4月第1版
- 《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 张隆栋等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1月第1版
- 《传播学概论》 [美] 威尔伯·施拉姆等著 新华出版社 1984年9月第1版
- 《传播学总论》 胡正荣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年4月第1版
- 《现代大众传播学》 陈龙编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1版
- 《数字化犯罪》 [英] 尼尔·巴雷特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9月第1版
- 《网络为王》 胡泳等著 海南出版社 1997年1月第1版
- 《国际关系史》 王绳祖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12月第1版
- 《世界史》 吴于廑 齐世荣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11月第1版
- 《国际关系学概论》 张季良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年6月第1版
- 《国际政治学》 畅征等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3月第1版
- 《大外交》 [美] 亨利·基辛格著 海南出版社 1998年1月第1版
-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 杰里尔·A·罗赛蒂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1月第1版

目 录

■ 绪论	刘继南	1
■ 第一章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印刷传媒		1
第一节 印刷传媒的产生发展及功能特点		1
一、印刷传媒的产生与发展		1
二、印刷传媒的功能与特点		4
第二节 我国印刷传媒的国际传播		8
一、对外宣传		8
二、国际报道		14
第三节 印刷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6
一、印刷传媒与国际政治		16
二、印刷传媒与国际经济		21
三、印刷传媒与国际文化交流		23
四、印刷传媒与国家形象		25
第四节 未来世界中的印刷传媒		28
一、高新科学技术对印刷传媒的影响		28
二、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对印刷传媒的历史要求		31
■ 第二章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国际广播		34
第一节 国际广播概述		34
一、国际广播的概念及历史沿革		34
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广播概况		38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三、我国的国际广播概况	44
第二节 国际广播的传播功能	47
一、国际广播的性质与任务	47
二、国际广播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50
三、国际广播是沟通国际关系的不可替代的大众媒体	52
第三节 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	53
一、我国的国际广播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53
二、西方国家的对华广播	57
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际广播	60
第四节 国际广播发展态势及我们的对策	63
一、国际广播发展的态势	64
二、我国国际广播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	71

■ 第三章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卫星电视…………… 74

第一节 卫星电视的兴起	74
一、通讯卫星的起源	74
二、卫星电视广播系统	75
第二节 卫星电视的发展状况	77
一、国际卫星电视的状况	77
二、我国的卫星电视	85
第三节 卫星电视的特点与功能	88
一、卫星电视的特点	88
二、卫星电视的功能	90
第四节 卫星电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96
一、卫星电视的跨国传播问题	96
二、卫星电视的单向传播问题	97
三、卫星电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问题	99
四、卫星电视的管制	102

■ 第四章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因特网…………… 108

第一节 因特网的发展与当今规模	108
-----------------	-----